论陈云关于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关系的思想

武力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就成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作为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陈云始终保持着冷静头脑,坚持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原则,特别是在国民经济被迫调整时,胆大心细,运筹帷幄,发挥了惯性的领导作用,陈云关于重速度、更要重效益,重眼前、更要重长远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在当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继续指导今天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关键词]陈云;经济发展;速度;效益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5)07-0008-07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方面受到外部世界对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经济落后状况的制约。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就成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从民主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到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再到邓小平提出至今仍在贯彻的“发展是硬道理”,反映了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本质要求。但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派生了党内的急躁情绪,以及出现了脱离现实和国情的“冒进”、“大跃进”、“高指标”、“大干快上”等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中多次出现波动和被迫调整,并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陈云始终保持着冷静头脑,坚持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原则,特别是在国民经济被迫调整时,胆大心细,运筹帷幄,发挥了惯性的领导作用。陈云关于重速度、更要重效益,重眼前、更要重长远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在当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可

以继续指导今天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战略与急于求成倾向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这是因为经济发展速度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超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速度,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中国也面临着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艰巨任务,赶超战略开始形成,这种赶超战略的特点有三个:一是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以外延型经济发展为主。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加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就呈现出“投资饥渴症”和“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而短缺则成为常态。

在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期间,如何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成了核心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

作者: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1](p.296)}这说明这个问题在当时是相当紧迫的。

中国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和实施计划管理,重要原因就是要通过这种制度,主要依靠国内的积累和集中资源,在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加快经济发展。从我国从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第十个五年计划,可以看出,加快经济发展和早日实现工业化始终是第一目标。而在此过程中,在处理速度与平衡的关系问题上,速度始终是第一位的,平衡则是紧张的平衡,甚至是不平衡。

二、20世纪50年代陈云提出经济建设要与国力相适应的综合平衡思想

“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和缺乏经验,曾出现过两次小的“冒进”,即陈云在1956年11月所说的:“经济建设,一九五三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一九五三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2](p.28)}这几年出现两次突破综合平衡的“冒进”,引起了陈云的高度重视,他在1956年10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时指出:“我国的建设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前三年的建设基本上按计划进行,今年规模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现在国内市场很紧张,人人都有意见。今后搞建设,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得到保证。”^{[3](p.338)}陈云还认为“看清楚商品供应紧张的原因很重要。这样就不会只在内部吵架,而不从整个财经工作中找原因。只在内部吵架,打破头也解决不了问题”。^{[2](p.29-30)}这里所说的商品供应紧张,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陈云从整个经济体制和建设方针层次寻找原因,提出了制约这个问题的“四大平衡”办法。

陈云之所以能够首先提出以“四大平衡”作为指标来贯彻综合平衡,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是因为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计划“平衡”只能是紧张的平衡。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陈云就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

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4](p.242)}1956年11月,陈云又提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我们的耕地只有这么些,但人口多,吃的、穿的都靠它。如果不搞建设,失业半失业照旧,社会购买力很低,商品供应当然一时可以不紧张,但不搞建设更不行。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而应是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2](p.29)}如何使平衡紧张到不至于破裂的程度,陈云抓住了影响宏观经济健康运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关键所在,即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问题。他认为,如果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信贷基本平衡、物资(商品)供应基本平衡、外汇收支基本平衡,就可以保证平衡不至于破裂。

陈云不仅在宏观上把握计划平衡,而且细致入微地从项目上具体控制地方和部门的“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各部门和地方为了加快发展,都想多上项目,少交利税,投资越算越多,而财政收入越算越少,结果国家整个投资规模就超出了实际积累能力。因此陈云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安排项目和预算。1954年2月20日,陈云在主持中央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小组会议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不要把次要项目算进去,而把主要项目有意漏掉。如果财源真的不够,就要考虑哪些项目缩小,哪些项目延期。^①同年5月3日,陈云在主持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时又指出:“中国还很穷,计划搞到现在这样的建设规模已经不得了了,不可能再增加建设投资。我们要避免冒险主义,当然,也要防止有钱

^①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这里所说的有意漏掉重要项目,是为了申报时投资规模不至于太大,但是一旦上马,重要项目投资就必须追加,有点类似现在的“钓鱼工程”。

不用的保守主义。”^{[3](p.208)}

1957年1月,陈云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综合平衡的经验教训,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平衡发展理论。陈云还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五条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制约方法:一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二是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三是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是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是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2](pp.52-55)}

为了有效制约经济建设上的“冒进”,陈云甚至提出“保守”要比“冒进”危害小的观点:“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2](p.52)}

三、20世纪60年代陈云关于后退 是为了更好前进的调整思想

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使得我国经济遭遇极大困难,国民经济处于严重的全局失衡状态,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已经达到发生普遍饥馑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的继续“跃进”,到1960年年中,已经破绽百出,难以继了。尽管当时在政治高压下,人们尚不敢否定“大跃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但是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党和政府不得不提出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

1960年6月14—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十年总结》讲话,承认在前一阶段存在着一些缺点错误,自己也有责任。毛泽东说:“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

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5](pp.214-215)}

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国民经济的问题更多地暴露出来,上半年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粮食供应日益紧张,外汇收支出现很大逆差,7、8月份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中苏矛盾也出现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于例行的北戴河会议上讨论国际共运和国内经济问题。会议初步议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问题。8月中下旬,李富春在起草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压缩重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8月30日—9月5日,国务院审议这个报告,大家赞成这些设想。周恩来认为,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的批语中提出:1961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大跃进”时期的结束,开始转入经济调整时期。

在1961年8月以前,由于认识上没有统一,中央主要抓了恢复农业、调剂市场和精简职工三个方面的工作。就其进展情况来看,农业方面成效较大,而工业方面因诸多原因又徘徊了半年多时间。1961年9月1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大区书记汇报会上讲话中针对工业调整指出:“1950年,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调整,那时工厂在资本家手里,财政金融、商业在我们手里,调整是考虑怎么放开,活起来,也就是限制少一些。现在不同了,工厂全在我们手里,但是也有相同之处,现在也是考虑如何使经济活起来,使经济周转起来,只要活起来就是最大利益。如果城乡、工农三种所有制稳定下来,经济活起来,我们就好办了。活起来是主要的,退够就是为的要活起来,打破死滞现

象。”^{[6](p.371)}对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陈云特别强调要注意“综合平衡”，并得到出席会议的毛泽东的赞同，请他专门写一条综合平衡。

1961年，按照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的指示，陈云做了大量深入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中，陈云特别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他说：“在干部中多注意提取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凡是提出一种意见的人，他总是看到了一点东西。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要怕，有错误的意见，可能使正确的意见更加正确……如果对方提出的不同意见是正确的，那就可以吸收进来，使正确的意见更加完备。”^{[6](p.328)}1961年10月14日—11月3日，陈云在北京主持召开煤炭工作座谈会，当座谈会谈到群众运动问题时，陈云指出：“一件好事在推广时，假如搞得太快反倒会把事情搞坏。由点到面很重要，一方面可以考验领导决定是否正确，另一方面也有训练干部、提高认识的作用。发扬民主是很重要的方法，要真正搞群众运动而不要强迫群众。”^{[6](p.380)}正是对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为他1962年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直接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准备了条件。

1961年12月6—8日，陈云与周恩来、李富春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2年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时指出：“明年是调整工作要紧的一年，工作相当繁重。人民公社还在继续调整，工业调整才开始，工业七十条在试点，减人工作还很艰巨。因此，真正的调整工作在明年。”^{[6](p.288)}

1962年是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性阶段。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就进一步统一党内认识和采取“伤筋动骨”的调整经济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得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真正落到了实处，使得调整工作迈入决定性的阶段。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及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会议对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成就、缺点错误及产生的原因，1962年的调整任务进行了广泛讨论，这对统一全党思想，纠正1958

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七千人大会”虽然将全党认识统一到调整路线上来，但是大会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估计尚不一致，有些人甚至过早地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会后，财政部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反映：1962年财政支出安排有二三十亿元赤字。由于每月的货币投放量增加（据统计，1961年12月底，货币流通量达到125.3亿元，比同年2月的117亿元增加了8亿元，到1962年1月底，进一步增加到135.9亿元，2月8日达到137亿元），通货膨胀的势头愈来愈大。

1962年2月21—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调整任务及措施。因该会在中南海西楼举行，又称“西楼会议”。西楼会议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讲透的问题进一步讲透。薄一波评价道：“七千人大会”出了题目，西楼会议及其后召开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则交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对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起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7](p.1047)}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为：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投机倒把在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陈云分析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以后，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办法：一是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约五年时间为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2](pp.200-205)}正是在这次讲话中，陈云提出了“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

西楼会议及陈云的讲话对当时进一步统

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方针起了巨大作用。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于2月24日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决定,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并且一致商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统一管理经济工作。

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指出:关于综合平衡,“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牵涉到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认识是不同的。我以为,现在首先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先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我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再说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6](p.211-212)}

同年3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三条方针:一是把十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恢复,后五年发展;二是对重工业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要“伤筋动骨”地砍掉一些,只有这样,才能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三是坚持搞综合平衡,只有按短线平衡才有真正的平衡,才能扭转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才能使经济协调、健康地发展。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讨论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实施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部署,同年5月7—1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一致要求大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充分估计困难,扎扎实实地工作,把经济调整好。他们还特别强调:如果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又不采取积极措施克服困难,那才是真正的右倾。这次会议同意中央财经小组报告中提出的实行调整工作的具体方针,这就是:要退够,争取快,准备慢。

从1961年8—9月庐山中央会议到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历时9个月,终于统一了全党对经济调整工作的认识,下定了坚决

后退的决心。正是这一点,使得1962年的经济调整工作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并成为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重大转折点。

四、改革初期陈云关于稳步前进思想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但由于这一时期我们还未能全面清理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倾向,以致使国民经济在前进中又陷入徘徊,并在经济建设的指导工作中出现新的失误。在计划工作方面主要表现为脱离国情,继续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制定计划时不断拔高目标,提高指标和速度。于是在1977年11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弥漫着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等不切实际的气氛,急于“大干快上”。这次会议讨论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按《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规定,到2000年以前,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会议也初步涉及有关“六五”计划的一些重点安排和经济指标。在1976年10月—1978年10月的两年,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国民经济在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老路上徘徊,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剧,经济效益差的局面没有改观。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指出:“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就带队进城要饭。”^{[2](p.236)}在讲到工业发展和引进项目时,指出:“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2](p.237)}

针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过高和缺口很大的问题,陈云在1月1日、5日两次作出批示,指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

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3月14日,陈云、李先念就当时的财经工作写信给中央,对今后财经工作提出了六条意见:一是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型;二是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是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是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调整过来;五是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六是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8](pp.404-406)}

1979年3月2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提出,搞四个现代化必须从国情出发,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不能认为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下来是修正主义,在一定情况下,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现在的比例失调比1961年、1962年严重得多,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最好三年,调整的目的,是要达到比较按比例地前进。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成立由陈云、李先念挂帅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当前的调整工作。同时,会议还就这次经济调整工作,调整农村政策,尽快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加快轻工业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压缩基建规模,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投资比例,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等四个方面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确定,标志着在经济建设中坚决清除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的开始,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9年9月18日,在国务院财经委召开的汇报会上,陈云指出:“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2](p.264)}“我认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重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

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这是我们除了上若干大项目以外所必须注意的大事,也是重点所在。用上述办法来进行基本建设,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技术改造,这是脚踏实地的前进,表面上看来像慢,但实际上是快……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2](pp.267-268)}

1979年和1980年两年的初步调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长期形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纠正过来,长期在经济建设中形成的“左”的思想也很难立即清除,同时在调整工作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从中央到基层的一些负责人,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对调整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对调整的方针执行很不得力。因此,这两年的调整工作虽然使经济形势出现好转,但仍存在不少潜在的危险和隐患,突出的问题是:一是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投资规模控制不住。全国在建大中型基建项目虽然比调整前减少了,但基本建设总规模没有真正压下来,国家预算内投资突破了计划,预算外投资急剧膨胀。在停建、缓建一批项目的同时,又新开工了一批项目,总规模仍然大大超过国家财力的可能。二是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财政支出过多,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和1980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赤字最多的两年。与此相应,银行增发货币130亿元,商品货源与社会购买力出现很大差额,市场物价波动。三是工业生产战线过长,工业改组和整顿进展不快。1980年以来,关、停、并、转了几千个企业,但同时又新建了2万多个企业,新投产的企业大多数是盲目发展起来的小型加工工业,加剧了本就很紧张的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矛盾。工业改组和整顿进展较慢,企业经济效益不高。

这些情况说明,虽然经过了两年的调整,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1981年,即“六五”计划的第一年,还会有一百几十亿元的赤字,几年来人民生活所得到的改善将会丧失,比例失调

的状况将进一步加剧,国家经济生活将发生严重混乱,安定团结的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在1980年10月、11月先后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上,都对经济工作进行了讨论。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对全国形势作了符合实际的估量的基础上,作出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决策。陈云在会议上讲话,分析了经济形势,总结了两年来调整中的经验教训,提出经济工作中的12条原则。他指出,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不是耽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坚持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上,真正“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会议对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了切合实际的调整和修订,为搞好“六五”计划开局奠定了基础,也为“六五”计划的制定提出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1980年11月2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和讨论国务院关于调整1981年计划设想的汇报时,陈云又说:“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要搞‘铁公鸡’,一毛不拔。有人说,这会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就是要一毛不拔,就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历史上有人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

就再机会主义一次。我的方案比这还坏,坏到什么都不搞。要上,讲理由,也有的是。三年不搞,一毛不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起推迟三年。”^[6](p.471)]当然,这只是陈云极而言之,并不是真要三年什么都不搞,只是反映了在当时他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的决心。

陈云关于重速度、更要重效益,重眼前、更要重长远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在当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继续指导今天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2]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4]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6]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涵 林

On Profoundly Comprehending “Three Important Points” Embodied i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spective Speeches in Memorial of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Chen Yun’s Birth,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ddressed an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hel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on June 12th in memorial of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Chen Yun’s Birth. There are three crucial points worth intense attention and profound comprehension with reference to General Secretary Xi’s recent speeches presented respectively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Mao Zedong’s birth and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Deng Xiaoping’s birth. The first point stresses the crucial function of a host of veteran revolutionaries who pushed forward the victory, cast off hardships, and accounted for the final succes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e second lies on the solid faith and the persistent aspiration for the sublime worship of communism rooted commonly in veteran revolutionaries’ mind a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spirit. The last suggests a fair attitude toward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historical status of veteran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Republic in different periods which constitutes one of the foremost preconditions for carrying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Zhu Jia-mu)

On the Spiritual Treasures Left by Chen Yun: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by Chen Yun on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at crux periods left highly invaluable spiritual treasures for later generations. The treasures include his loyalty and steadfast faith for ideals,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working attitude, lofty demeanor of his diligent performance on politics and service for people, his insistent pursuit of truth with extraordinary courage, and his ideals of indifference to fame and fortune. 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he expounded the aggregate balance and overall planning of two resources from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s, the expansion of exports, “Three Cores and Three Supplements”, and the co-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with reference to a certain proportion. 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style and a clean government, he stre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rty’s conduct and discipline, fortifying the Party members’ resistance to corruption through the Party-style and the Party-member-integrity education. He also put emphasis on the persistent adherence to “The Mass Viewpoint and the Mass Line” and cadres’ focus on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in terms of movement and guidance. To realize this goal, the spiritual thoughts with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acting practically according to realities should be employed. Our commemoration of Chen Yun is for inheritance of his spirits and practice in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en Yuan)

On Chen Yun’s Thoughts on Relation between the Speed and the Uti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the New China was just found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t up the goal to catch up with and surpass over developed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s a long-termed chief responsible for economic work, Chen Yun kept a calm and reasonable mind all the time and stuck to the tenet of aggregate balance and steadfast advance. Especially when our national economy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pressing need for modification, he brought his leadership into full play with inertial effect. Besides, he was bold and careful as well as adept at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Chen Yun’s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focusing on economic utility over growth and laying weight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ver current achievements not only contributed greatly to China’s economy then, but left spiritual measures for us to continue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Wu Li)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To-Be-Solved Problems for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up a Well-Off Society in Rural Areas: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up a well-off society in a comprehensive way,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rural areas where still continue to be a bottle neck. The extensiv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griculture, lagging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in rural areas, comparatively low labor quality and weakening of organization function demand a prompt solution. Without the comprehensive realiza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rural areas, a whole well-off society can hardly be counted as one. We should stick to problem-solving orientation, transform the modes of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optimize atmosphere for rule of law in rural areas, stress the leading role of science and culture, and intensify the management of cadres in villages.(Yin Guang-tai)

The Practical Dilemma and Governance Prospect of China’s Letters and Calls System: As a fundamental ruling resource for CCP and the embodiment of the mass line principle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 Letters and Calls System plays distinctive social rol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Nowadays, the rocketing total number of Letters and Calls and its governance costs are continually triggering the bitterness and sensitivity of the whole nation and jeopardizing proper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underlying cause lies in the accumulation of historical issues and the repetition of relocation and securities issues, the upgrade of lawsuit-related issues, and the emergence of psychiatric issues, etc. The strategy for China’s Letters and Calls System to ease the practical dilemmas of China’s Letters and Calls System involves loosening local liabilities, avoiding stability-maintaining fallacy, establishing access mechanism, optimizing governance procedure, activating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introducing social power. (Liu Zheng-qiang)

On the Main Character of China People’s Army: China People’s Army (CPA) contains obvious Chinese features in terms of nature, function and traits. It represents the army of the proletariats. It not only belongs to people, serves people and relies on people while it obeys absolut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PA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as defensive combat team and shoulders